

鲁迅史实求真录

湖南文艺出版社 陈漱渝著

鲁迅史实求真录

陈漱渝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鲁迅史实求真录

陈漱渝 著

责任编辑：黄仁沛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375 插页：2 字数：240,000

印数：1——2,600

ISBN7—5404—0122—2/I·103

统一书号：10456·274 定价：3.20元

序 言

丁景唐

在科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倡导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他们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对史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马克思一八七二年五月在《马克思的答辩》中就自豪地说过：“我的《资本论》一书引起了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多官方材料来评述资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六五页）鲁迅正是坚持了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来研究中国历史，用小说，用杂文，实践了他遵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剖析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的意愿。

现今的鲁迅研究工作，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从多种学科作综合性研究，出现了一批较有分量的论文。这是“鲁迅学”走向繁荣的一个标志。这些研究的特色是资料丰富，运用资料的角度新，因而结论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我作为鲁迅研究行列中的一员，对于近几年来的鲁迅研究的进展是感到欣慰的。然而，研究方法可以多样，资料却必须翔实。那种

“以论带史”，不管历史资料的真实性的牵强附会的治学态度，是应该摒弃的。因此，不能把资料收集、整理、辨析、编纂等工作视为可有可无的细枝末节。我们应该从历史研究的史料学的角度，认真对待这一问题。遗憾的是，史实方面的错误在有些论著中仍有出现；即使在一些具有权威性的著作中，有时也没有能避免这种情况。细究起来，有的由于当事人年事已高，记忆不确，时间、人物、事件先后混淆；有的由于研究者对同一事件的多重回忆、资料缺乏辨析和正确的判断；有的由于研究者在运用间接资料时因袭了他人的错误；有时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信息不灵，无法看到新公布的确凿史料，造成失误。这些都是可以谅解的。然而，对那种主观臆断、哗众取宠，甚至不负责任地混淆史实的做法，虽属极个别的现象，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鲁迅研究工作者都有责任根据确凿的史料进行去伪存真的辨析工作，澄清事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如果运用史料，出现了差错怎么办？唯一正确的态度是及时地、公开地订正，以免以讹传讹，贻误当今和往后的读者。自己发现了自己文章的错误应主动订正。别人发现了自己文章的错误，应欢迎别人订正。研究工作人员发现了回忆者的回忆有错误时，也应该以忠于历史的诚挚态度积极指出。总之，凡是有所追求的研究者在著作中都不会一点不出差错，然而一旦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就应该纠正。即使是被人们公认的成就较大的著名人士，对待别人的——尤其是青年的批评，也应着眼

目 录

序言	丁景唐 (1)
----------	---------

求真篇

鲁迅与资料工作	(1)
---------------	-----

鲁迅研究工作中的资料问题	(17)
--------------------	------

写出真实

——朱正《鲁迅传略》修订版读后	(31)
-----------------------	------

“文华而不失实”

——《民族魂·跋》	(40)
-----------------	------

沿着鲁迅开辟的路

——《当代作家谈鲁迅》编后	(45)
---------------------	------

一得篇

从并肩战斗到“默不与谈”

——钱玄同日记中的鲁迅	(53)
-------------------	------

东有启明 西有长庚

——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	(68)
--------------------	------

血的蒸气 真的声音

——许广平三篇遗稿读后	(89)
-------------------	------

附录：许广平遗稿三篇	(94)
------------------	------

友谊的记录

——许寿裳日记中的鲁迅	(101)
鲁迅生平杂考	(110)
鲁迅作品中的一些人物	(142)
读鲁迅作品札记	(201)

考异篇

一篇蹩脚的“创作”

——《毛泽东到八道湾会见鲁迅》质疑	(227)
-------------------------	-------

一场应该结束的辩论

——对《再谈毛泽东会见鲁迅》一文之我见	(240)
---------------------------	-------

回忆录要存真求实

——读《关于〈毛泽东到八道湾会见鲁迅〉 一文的两封来信》	(245)
---------------------------------------	-------

史料，不容掺半点假	(251)
-----------------	-------

——三驳“毛泽东会见鲁迅”说

《大众电影》刊登的一篇不实之文	(265)
-----------------------	-------

附录：关于《筹拍历史巨片〈鲁迅传〉始末》一文中

一些事实的调查	(274)
---------------	-------

偶感两则	(276)
------------	-------

日本读者对于鲁迅死因的看法	(283)
---------------------	-------

附录：揭开鲁迅死因之谜 鲁迅先生并非死于肺病 鲁迅儿子周氏否定鲁迅之死与日本原军医有关 的论点 鲁迅死因之谜的论争可以终止了	
--	--

信息篇

港台鲁迅研究状况·····	(291)
鲁迅著作的国外译本·····	(319)
国外鲁迅研究状况·····	(337)
附录：扶桑日记——赴日本考察记实·····	(364)
后记 ·····	(405)

鲁迅与资料工作

马克思曾经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事科研工作的切身体会，也是对资料工作重要性的正确估价。实践证明，古今中外任何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人，无不十分注意资料的积累，无不把自己的科学结论建立在经过严格检验的真实材料的基础之上。

作为一个在世界文化史上作出了多方面卓越贡献的伟大人物，鲁迅很早就开始以不图爽快、不怕艰难的精神，从事收集资料这一寂寞而崇高的工作。他象一只勤劳的蜜蜂，在知识的百花园中孜孜不倦地广采精酿，用智慧的纯蜜造福于人类。仅据现存《鲁迅日记》的“书账”记载，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六年间，鲁迅节衣缩食购置的书籍就达三千余种，一万四千余册。在鲁迅搜集的资料中，有给他思想以滋养的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也有丰富的文学、史地、美术及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书籍。鲁迅涉猎的资料不仅十分广泛，而且善于独辟蹊径，为

学术开山。佛学经典，一般人读后是容易趋于消极的，但鲁迅却利用来作为研究人类思想发展史的必备资料。金石碑帖，旧时代的考据家、鉴赏家往往只注意其文字，而鲁迅却同时注意上面的花纹图案，借以了解当时的战斗、刑戮、饮宴、游猎、娱乐、礼仪等方面的状况，作为研究文学史的辅助资料。北京的传统木刻笺纸，三十年代初期已日益衰落，行将绝迹。鲁迅和友人郑振铎“搜索市廛，拔其尤异”（《鲁迅全集》第7卷第405页），精选出刻有人物、山水，花鸟画的诗笺三百三十二幅，编为《北平笺谱》，自费印行，从而为中国木刻史保存了“极可宝贵”的资料，使气息奄奄的中国传统木刻得以复苏。大约在一九三五年前后，鲁迅还一度收集本国和日、英、法、德、苏等国的邮票。从用粗糙纸张仓促印制的苏联邮票上面，鲁迅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所经历的艰苦历程。就这样，丰富多彩的资料在鲁迅面前展现出了广阔的世界，如浩瀚的海洋，苍茫的宇宙……

一、锲而不舍 锐意穷搜

用“竭泽而渔”的精神尽力掌握坚实宏富的第一手材料，是鲁迅从事创作或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一九三四年冬，鲁迅跟郁达夫、刘大杰谈到编写文学史问题时指出：要积累材料，要多看原书。你抄我的，我抄你的，那就是取巧。（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载《文艺报》1956年19期）鲁迅在撰写杂文之前，总是要想方设法查阅有关材料，

有时甚至为了一篇材料花费几天功夫。这时候，他就会感慨地说：“唉，翻书也不容易。”正因为如此，鲁迅的杂文不仅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而且具有高度的史学价值。在进行学术研究之前，鲁迅更是要呕心沥血地做好独立的资料准备。比如为了撰写《中国小说史略》这部篇幅不算很长的学术著作，鲁迅前后几乎用了二十年时间搜集资料，辑成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三部资料专书。《古小说钩沉》辑录了汉至隋的散佚小说三十六种，约近二十万字；《唐宋传奇集》辑录了唐宋传奇中的重要作品四十五篇，约十七万字；《小说旧闻钞》辑录了有关通俗小说及其源流、评论等方面的资料约九万字，涉及宋至清代的小说四十一种。鲁迅在《〈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中回忆了当年辑录小说史料的困难境况和甘苦心情：“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自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由此可见鲁迅搜集资料用力的勤勉。一九二八年夏，鲁迅曾偕许广平在杭州逗留了近一星期。这是鲁迅婚后唯一的一次短暂游憩，有人将这段时间戏称为鲁迅的“蜜月”。但据当时始终陪伴着他们的许钦文说，鲁迅当时也曾到杭州的浙江省图书馆查资料，因为该馆除了藏有《四库全书》以外，还有不少善本。（许钦文：《鲁迅先生与图书馆》）此外，鲁迅还曾赴西泠印社购买画像拓本，到抱经堂书店购买旧书。直至临终前不久，鲁迅还对当时一些中国人做事缺乏韧性不以为然。他说：“中国没有肯下死功夫的人。无论什么事，如

果继续收集材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许广平忆鲁迅·片断的记录》）

限于经济条件，鲁迅不可能购齐研究和写作所必需的参考书；有些书即或有钱也买不到。因此，抄录成了鲁迅搜集资料的主要的方式之一。早在少年时代，鲁迅就经常抄书，如陆羽的《茶经》、陆龟蒙的《五木经》和《耒耜经》等。鲁迅十七岁时手抄的《二树山人写梅歌》、《桐华阁诗钞》、《镜湖竹枝词》，是目前发现的他最早的三种手迹。据统计，光是辑校《古小说钩沉》，鲁迅就从各种不同的类书中抄录了六千多张大小不同的纸条。在翻阅杂书、慵于抄写的时候，鲁迅也采用夹纸条的办法备忘。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北新周刊》分三次连载的《书苑折枝》，就是他根据以前偶夹的纸条重新整理的。此外，鲁迅还非常注意从报纸上积累资料，经常做剪报工作。鲁迅所写的数百篇杂文，有相当一部分是运用报刊上新闻、通讯、专文甚至广告和标题作材料写成的。上海鲁迅纪念馆至今仍保存着一本鲁迅的剪报簿，里面的资料都是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三年间鲁迅从《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及《大晚报》上剪下来的，内容大都是国民党反动派摧残进步文化界的消息报道以及直接攻击他的文章。鲁迅准备在适当的时机运用这批反面材料有力地打击敌人。清光绪年间，上海出版过一种名为《选报》的杂志，专选各种报上较好的论说。鉴于剪报的重要性，鲁迅希望能有“好事之徒”也出版一种类似的刊物，专收各地报上奇特的社论、记事、文艺、广告等，汇印

成册，以显示各种“社会相”，并减轻个人的剪报之劳。

（《鲁迅全集》第10卷第48页）

为了提高收集资料的效率，鲁迅十分重视利用被称为“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的目录书。早在留日时期，鲁迅为了译介东欧各“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经常查阅各种书目（如《文学的反响》半月刊上刊登的新书目专栏），然后再通过东京的丸善书店往欧洲订购。至今得以保存的鲁迅《拟购德文书目》，就列有德国五家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一百二十余种。为了研究国学，鲁迅也常津津有味地阅读中国的目录书，借以摸索治学的门径。象《二十五史人名索引》、《陕西碑林目录》、《朱氏汇刻书目》等，就是他经常摩娑的目录书。许广平回忆说：“鲁迅先生研究学问的方面很广博，大致对于前辈的从书目入手的方法也并皆采纳，在他消闲的时间，就时常看见他把书目看得津津有味，我却从不爱沾手的。有时鲁迅先生也解释给我听：‘这是治学之道，有人偷偷捧住《书目答问》死啃一下就向人夸耀博学的了，其实不过如此而已。’”（《许广平忆鲁迅·鲁迅藏书一瞥》）在教育部供职期间，鲁迅曾推荐友人张宗祥到京师图书馆编善本书目。一九二七年，鲁迅在《语丝》周刊第一百四十六、一百四十七期发表了日本学者辛岛骁提供的两种中国小说目录，并对《也是园书目》作了考订，供“留心小说史者”参考。一九三〇年，鲁迅挚友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入清华大学国文系就读，请鲁迅开列一份国学入门书目。鲁迅开列了十二种，其中包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因为这本书

篇目不繁，检查较易，对所列诸书加有简单的评语，“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鲁迅同时提醒许世瑛，这一书目的评语是“钦定”的——即评价完全以帝王的利害为标准，使用时不能不予以警惕。

二、善于选择 博中求精

对于资料不但要有穷搜的毅力，而且要有选择的眼光。鲁迅研究中国历史，并不盲从官修的正史，因为正史不但装腔作势，大摆架子，而且涂饰太厚，废话太多，论断和记载有时极不可靠，恰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能看见点点的碎影。鲁迅认为，笔记野史虽然也免不了有讹伪，挟恩怨，但其中却保存了相当数量的正史中没有的珍贵史料，可以帮助我们窥见被史官们掩盖的历史的真实面目。因此，鲁迅常披阅宋明野史，借以剖析现实问题的历史渊源，把现实生活中黑暗势力的祖坟刨一下。野史对鲁迅的创作也有很大的助力。周作人在《鲁迅的国学与西学》一文指出，鲁迅“从《谈荟》知道列代武人之吃人肉，从《窃愤录》知道金人之凶暴，从《鸡肋编》知道往临安行在去的山东义民以人脯为干粮，从《明季稗史简编》知道张献忠和清兵的残杀，这些材料归结起来是‘礼教吃人’，成为《狂人日记》的中心思想。”（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对于遍及全国各地的方志，不少封建文人由于阶级偏见和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往往采取鄙薄否定的态度，贬之为“陋志”，“非著述之体”，

“不足供大雅之参考”。而鲁迅却认为方志虽然也不免打上阶级的烙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却是保存社会史料的渊藪，其中有关民间生活的记载（如赋役、户口、物产、物价等），尤为可贵。鲁迅在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供职期间，就以教育部名义，咨各省区飭属征取最新志书，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今天北京图书馆藏有大量方志，其中就有鲁迅的一份劳绩。一九三四年，正当某些学者以高价争购明人小品、清代禁书的时候，鲁迅却提醒有心人留意《东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上谕八旗》、《雍正朱批谕旨》这类无人问津、售价低廉的书籍，因为其中保存了清王朝的内阁档案。鲁迅说：“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将其中的关于驾御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鲁迅全集》第6卷第58页）鲁迅不受时尚的影响，能够从别人的不曾注意的历史文献中提出与现实斗争密切联系的研究课题，表现出了撷取史料的真知灼见。

收集资料，鲁迅主张“竭泽而渔”，力求齐备；运用资料，鲁迅主张严加筛选，博中求精。在《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中，鲁迅指出《杨太真外传》的作者乐史“滥于采录，转成繁芜”，意思是批评他收集资料贪多反而变成繁杂。鲁迅编写《汉文学史纲要》时，在资料的选择上就力求做到典型精当。比如该书第二篇论述《诗经》，只举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六篇（颂一篇，小雅一篇，大雅

一篇，国风三篇）为例，就清晰地勾勒了《诗经》三百零五篇的基本轮廓，收到了以少胜多、以简驭繁的效果。

三、存真求实 辨厘识伪

资料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它的真实性。因此，“存真”应该成为我们搜集和运用资料的一条根本原则。任何资料，只要是真实地反映了客观实际，就无不具有一定的质量和参考价值。反之，如果篡改史料，编造赝品，那就不但无益，而且有害。鲁迅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高度重视资料的可靠性，讲求准确实用，而不是哗众取宠，以孤本秘籍为惊人之具。他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参考书籍罕见旧刻，所用为资料的几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于石印本。他收集的类书、丛书，也没有什么难得的海内孤本。这决不是单纯限于购书之力，而且还因为“珍本”并不就是“善本”。鲁迅指出：有些珍本，“正因为它无聊，没有人要看，这才日就灭亡，少下去；因为少，所以‘珍’起来。”（《鲁迅全集》第6卷第418页）一九三三年六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指令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与商务印书馆订立合同，影印北京文渊阁所藏《四库全书》未刊本，编成《四库全书珍本初集》。鲁迅当时就尖锐指出：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鲁迅全集》第6卷第182页），致使有些原本非删则改，语意全非，如果有别本可得，就应该用别的“善本”来代替。倘若影印经过

篡改的古籍以赢利，必将使真正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的善本湮没下去，贻误将来的认真的读者。

对于在历史资料上滥施刀斧的恶劣行径，鲁迅极为愤慨。他在《唐宋传奇集》序例中谈到，书贾在刻印《说海》、《古今逸史》、《五朝小说》、《龙威秘书》、《唐人说荟》、《艺苑摛华》这些丛书时，为了使全书目录显得光怪陆离，借以迷惑读者，往往乱造篇名，改题作者姓名，致使晋、唐几朝的小说传奇被砍头砍足，蒙受了一场可怕的灾难。比如号称“唐人小说之中心”的《唐人说荟》（也称为《唐代丛书》），欺人之处就很多。鲁迅在《破〈唐人说荟〉》一文中列举了七点：“一是删节”，“二是硬派”，“三是乱分”，“四是乱改句子”，“五是乱题撰人”，“六是妄造书名而且乱题撰人”，“七是错了时代”。象这种谬误迭出的书，“倘若单以消闲，自然不成问题，假如用作历史的研究的材料，可就误人很不浅。”鲁迅打了两个比方：“夫蚊子惜鼻，固犹香象；嫫母护面，诟诬毛嫱……”（《鲁迅全集》第10卷第140页）意思是：蚂蚁虽小，但却跟大象一样爱惜它的鼻子；传说中黄帝的妃子嫫母容貌虽然丑陋，但她对自己面孔的爱护，决不会逊于传说中的美女毛嫱。可见对任何史料进行篡改，都是对学术的亵渎和对真理的背叛。在《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懣”》一文中，鲁迅还指出明人好刻古书而妄行校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乱点一通、佛头着粪，是除水火兵虫以外的古书的“三